

蘇聯勢力下外蒙的發展動向

喬一名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蘇聯極力擴張其在蒙古之勢力，其目的在於使蒙古淪為其附庸，並藉此以威脅中國之安全。蘇聯在蒙古之發展動向，可分為三個時期：一、前

一、前 言

八〇年代中期以來，蘇聯極力與中共改善雙邊關係，中共則提出三項前提，其中之一即蘇聯軍隊必須從外蒙撤出。蘇聯宣稱其不能以第三者之利益為犧牲，作為抵制中共的條件。以致外蒙問題，即成為影響中、蘇共未來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今天，蘇聯在外蒙的勢力之盛，及其影響之深遠，足令所有中國人民警惕。外蒙政權之動向，亦頗值國人關心。因為，外蒙古本是中國之領土，早自一六七一年即列入中國版圖，我國政府視外蒙為中國固有領土之立場亦從未改變。因之，蒙族仍然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體。回顧一九四五年，中國在重大犧牲下，贏得抗日聖戰，但被蘇聯在「強權外交」的策略下，巧奪外蒙，偽稱「獨立」。其實，外蒙所謂之「獨立」，完全係由於蘇聯有目標之長期策劃所致。外蒙之政治、外交、軍事、財政、經濟、文化、教育等均在蘇聯之支配與控制下，其為蘇聯之傀儡，自不具備獨立國家之資格。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新疆白塔山犯邊事件，足令世人明瞭所謂外蒙「獨立」的真象。

外蒙領域甚為廣闊，介於中國中原與蘇聯西伯利亞之間，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當年（一九四五）史大林堅持強佔外蒙，其著眼點便在於確保西伯利亞的安全，與進一步赤化中國。一九四九年後，中共藉著蘇聯之力赤化中國大陸後，毛澤東因形勢所逼無力向史大林要求收回外蒙。隨著中蘇共關係的變化，外蒙與中共、蘇聯之間的關係趨於微妙。蘇聯一直想利用外蒙兼併內蒙，實現蠶食中國的目標，雙方在內外蒙問題勾心鬪角已久。外蒙內部想脫離蘇聯獨立的一派人，也想利用與中、蘇共的矛盾來實現其獨立。因之，這一派人不願完全聽命於蘇聯而與中共敵對。外蒙有時也會發出「親中共」的言論，其故在此。

今日外蒙雖然是在蘇聯勢力支配之下，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未來不是沒有轉機的。外蒙的經濟產值目前還不算大，而其所以為世所重乃是在戰略和民族兩個方面。戰略方面即如前面所言，逐漸蠶食中國，削弱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進而威脅中國心臟地區，控制並赤化全中國，退亦可作為其西伯利亞工礦區的屏障。目前在戰略上蘇聯佔盡了優勢，中共則處下風。但在民族方面

，中共採擴大「內蒙」的行政區，今日內蒙擁有一百一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領土面積上，足以與外蒙相抗衡。而內蒙人口已從一九五四年的四百餘萬人增至目前的一千九百萬人，漢人與蒙人是十與一之比。內蒙爲外蒙人口的十倍。①因之在民族問題方面，中共擺出的形勢已使蘇聯與外蒙不敢再提內外蒙統一的問題。

二、外蒙概況及其與中、蘇共的早期關係

外蒙現稱爲「蒙古人民共和國」。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滿清帝制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外蒙即在帝俄的慫恿下，於翌年要求「獨立」。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五日，中俄互換聲明，帝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外蒙宣佈取消自治，十二月一日復歸中國管轄。一九二一年六月廿八日蘇聯紅軍進入外蒙，外蒙當局又藉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而叛變，於七月十日在庫倫成立僞蒙人民共和國，是爲蘇聯的第一個附庸政權，其實施的共黨體制，亦完全是蘇聯的翻版。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中共承認外蒙「獨立」，至此，外蒙又處於世界兩大共黨——蘇聯與中共的中間位置，使其具有新的重要性了。②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末第一次訪莫斯科時，即在史大林政治壓力下同意創造條件協助內外蒙統一。在一九五〇年二月與蘇聯簽訂的同盟條約中，就公開聲明保證外蒙的「獨立地位」。一九五二年九月，外蒙部長會議主席尤·澤登巴爾(Y. Tsendenbal)，訪問北平，與中共簽訂「經濟文化合作協定」，中共首開承諾給外蒙經援。一九五四年蘇聯、中共與外蒙三方同意，共同修建烏蘭烏達——烏蘭巴托(庫倫)——內蒙集寧的鐵路。這條縱貫外蒙大地的鐵路一旦完工，就將把外蒙與中國大陸、西伯利亞連貫起來，其戰略價值十分重要。

外蒙新政權成立之初，即以蘇赫巴托爾(Sukhe Bator)爲軍事部長，喬巴山(Khorloin Choibalsan)爲副部長。此兩人的最初黨政改革和其思想，對外蒙的影響十分深遠。一九五二年喬巴山死亡後，其助手澤登巴爾繼承總理與第一書記職位。一九五四年澤登巴爾專任總理，將第一書記讓予達姆巴(D. Damba)。③

外蒙處於今日的世局中，具有突出的兩項地理因素。其一，即如前述的外蒙位於世界兩大共黨的中間位置，因之使其具有新

註① 根據一九八二年中共第三次人口普查資料，內蒙人口爲一千九百餘萬人。另據外蒙「中央統計局」於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六日發表一九八四年人口爲二百八十六萬餘人。

註② Victor P. Petrov, *Mongolia-A Profil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0), pp. 3-6.

註③ Richard A. Geisler,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Mongolia," *Far East Survey*, December, 1959, pp. 182-188.

的重要性；其二，外蒙擁有廣大的幅員，在地理上頗具獨立性。外蒙面積五十九萬一千一百餘平方英里（一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為法國的三倍。超過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愛爾蘭和法國面積的總和，號稱為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外蒙東西相距一千四百六十八英里，南北是七百八十一英里。一九八四年統計，總人口有一百八十六萬六千餘人，每平方公里平均一·二人。^④

位於中亞山脈心臟地帶的外蒙，三面與中國大陸接壤，一面與蘇聯交界，這個內陸封鎖的外蒙高原，由於其戰略地位、天然資源、及作為蘇聯在亞洲的「櫥窗」，而益增其特有的政治地位。外蒙地理景觀，在單調中亦顯示出其複雜性。其境內西北部，山脈縱橫，間或有綠色草原，東部地勢比較平坦。南部是一片多沙礫的半草原性的無垠沙漠——戈壁，約佔蒙古土地的三分之一。目前，外蒙人口雖有一百八十餘萬人，但多數是從事遊牧工作，近年因逐漸工業化，其遊牧人數日形減少，漸傾向定居。外蒙人口密度低，係由於歷史上大量人口分佈在內蒙、甘肅和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等廣大地區。估計上述地區約有四百萬以上的蒙古人，所以凡是鼓吹大蒙古民族主義的運動，均為中蘇共當局所反對。

外蒙又是富於湖泊的地區，有出水口的湖泊通常都有淡水。外蒙有十六個較大的湖泊，大部份均位於西北部。有二百條大小河川流入苦味的烏布沙泊——面積有一千三百平方英里，是一個鹹水湖。由四十六條河流匯聚的高山大湖庫蘇古爾泊，面積有一千方英里，是一最深（一千七百英尺）與最大的淡水湖，有時也稱做「蒙古海」。西北湖泊分佈的地區，有湖泊、瀑布與泉水，它們星羅棋布，點綴其間，是外蒙最優美的風景地區。^⑤

外蒙出產有一百種以上的礦物，業經鑑定，具有重要用途。能源方面有煤、褐煤、石油等；金屬礦源方面有鐵、鈾、錳、銀、砂金、鎢及輝目礦等。其中最大的能源生產地在南戈壁省，估計其焦炭蘊藏量達三十億噸。一九四一年所發現的大油田，位於賽音商德之南方，靠近中國大陸，現正在開採中，因其接近蒙古縱貫鐵路，運輸亦頗方便。早在本世紀初，外蒙之資源即曾引起日俄兩國之垂涎。日人田中「侵略計劃」中曾指出，要以外蒙作為侵華及進攻西伯利亞的基地。蘇聯對外蒙的侵略，更是處心積慮，以致造成今天外蒙一邊倒的情勢，且成爲中蘇共互相衝突的地區之一。所以紐約時報曾撰文形容外蒙是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一堆火柴，較中東或南非有過之而無不及。^⑥

三、外蒙的經濟發展

數十年來外蒙與蘇聯的不尋常密切關係，可以說是基於施與受之間的相互利用。但其本質上却是蘇聯欲伸展其勢力，控制外

註④ 同註①。

註⑤ Victor P. Petrov, *op. cit.*, p. 17.

註⑥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8, 1977.

蒙的政、經、軍和其外交動向。蘇聯雖倡言保護、援助外蒙，而事實是蘇聯着眼於尋求意識形態上類似的伙伴，更想策動、輸出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期外蒙成爲它對外宣傳的一個活樣板。更甚者，外蒙的戰略性地理位置，退則可以作爲保衛西伯利亞的屏障，進則可作爲威脅中國大陸的前進基地。同時，外蒙對蘇聯在國際政治活動和宣傳上來說，是一個有利用價值的盟邦。因爲外蒙不僅在聯合國跟著親蘇集團投票，而且常以蘇聯代理人的姿態出現於蘇聯被拒絕加入的亞、非洲國際會議，經常扮演蘇聯的「代言人」角色。另一方面，外蒙本身的經濟雖處於落後階段而有待開發，但它仍以贈與或小型經援方式援助亞、非洲其它的落後國家。⑦顯然這是出於蘇聯的授意，其所提供的援助亦來自蘇聯。簡言之，蘇聯經常利用外蒙以達到它與中共在第三世界國家中爭奪影響力的「工具」。而外蒙也樂於接受這個工作，好改善其本身的國際形象。

外蒙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完全是在蘇聯一手「指導」下循序漸進的，也是一體施爲的，完全容不得外蒙有絲毫的自主權。外蒙政權在過去半個世紀多的歲月裏，在軍、經、文教各項建設之發展，大體可分爲如下各階段：從一九二一到二六年，是借重蘇聯力量，鞏固其政權；一九二五到四〇年，是邊從蘇聯指導，運用政治權力，消滅其內部封建階級及資本主義特點；一九四〇年以後到目前，是仿效蘇聯，向社會主義發展的時期。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五日是「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署四十週年紀念。拆穿來看，所謂「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乃是外蒙被納入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的賣身契。蘇聯通過這一條約，片面性的強化了它在遠東，特別是在外蒙的軍、經和政治諸方面的利益。

四、蘇蒙一體的政、經發展

外蒙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完全是在蘇聯一手「指導」下進行的。戰後外蒙始有餘力在蘇援下發展其落後的經濟。當時最主要之措施，是配合蘇聯戰後的需要，確定其兩個五年設計畫。即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四到一九六〇年的兩個五年設計畫。這兩個五年計畫的執行，也僅僅使得外蒙脫離原極落後的畜牧時代，進入農業與工業萌芽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最重要的經濟開發是交通建設，尤以鐵路建設特具戰略價值。這就是從外蒙延伸到內蒙集寧的縱貫鐵路，全長約一千一百公里。

從一九六一到六五年是外蒙實施第三個五年計畫時間，有少數外蒙高幹，希圖扭轉其一邊倒的政策，而想來個左右逢源——既接受蘇援、也同時接受中共的援助。因此，外蒙起初或許有意引進中共的勢力，來抗衡蘇聯，無奈在中蘇共衝突之際，蘇聯是

⑦ Dupuy, Trevor N. and Blachard, Wendell, *Area Handbook For Mongolia*, (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970), p. 249.

絕不容許外蒙有任何騎牆的外交政策出現的。一九六〇年五月卅一日，周恩來赴烏蘭巴托與外蒙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支援外蒙實現第三個五年計畫，貸給二億盧布，並自一九六一到六五年，協助外蒙建設一個棉紡織廠（年產三千萬公尺）；一個玻璃板工廠（年產五萬平方公尺）、兩個製糖廠、一個玻璃日用品工廠。中共援蒙計畫最大項目，是供給廉價物品及龐大勞工。中共在六十年代的經援外蒙，確曾在國際上引起相當程度的震撼。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魯朋（Robert A. Rupen），在其當年所著的外蒙古一書中曾言：「中共的主動衝力是如此大，中國大陸豐富的物資吸引是如此具有壓倒性，使人難以看出到頭來蘇聯如何能保持它的地位。蘇聯現在仍然是外蒙的第一勢力，但五年後這極可能不再是真實。」^⑥當然，未來事實的演變，並非全如魯朋教授的預測。中共的「大躍進」及「文革」，幾乎將中國大陸經濟弄成崩潰的地步。一九八三年內，外蒙驅逐在其境內的華人，這些被逐的華人，都是中共六十年代初派遣往外蒙工作的華工，因各種因素而定居下來的。中共當局對外蒙驅逐華工的行動，並未採取高姿態的對抗，僅提出外交抗議。主要原因是中共不願在尋求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過程中，因外蒙問題而又節外生枝。

在中共援蒙的蜜月年度一九五九至六一年，蘇聯當局為表示它纔是外蒙的老大哥，也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示意澤登巴爾率團赴莫斯科，並再簽「經援協定」，大幅度增加對外蒙貸款六億一千萬盧布。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三日，克宮又追加四千二百萬盧布的貸款。^⑦克宮的慷慨經援，外蒙是要付出政治代價的，澤登巴爾集團為了表示在行動上親蘇，就藉著蘇聯之力，大舉整肅親中共派。本來任何國家的共黨，都有派系鬭爭。但，外蒙在六〇年代初的政治鬭爭，却含有親蘇或親中共的鬭爭成份，這從五九年三月到六〇年末的一系列大整肅事件即可看出。這一期間，澤登巴爾整肅了當時第一書記達·達姆巴（D. Danba）並取而代之；又以曾狄來取代鮫倫也夫（Surenjav）為第二書記；吐莫奧察（Tomo-Ochir）及波爾金揚（Balinyan）取代達姆巴（Dandin）及拉姆清（Lamchin）為政治局委員，莫隆札姆茲（Molomjants）及札格代羅爾（Jagvaral）取代波爾甘（Balgan）及桑姆丹（Sandan）為政治局候補委員。^⑧在上述的整肅事件中，尤以原蒙共第一書記達姆巴的整肅最具代表性。當中共勢力在外蒙日漸增長時，達姆巴被視為曾得到中共的幕後支持。但是親蘇派由於蘇聯與中共間相互鬭爭的暗流，長久多眠的蒙古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中共顧問和工作人員的憎厭與受到急劇推進的集體化運動的壓力等，便不得不採取行動，整肅了親中共派和地方民族主義派。此一連串整肅事件影響十分深遠，是中蘇共戰後在外蒙又一次力量的較量，最後是蘇聯佔居優勢。近年來隨著

註⑥ Richard A. Geisler, *op. cit.*, p.188.

註⑦ 張超民，俄帶條路下之外蒙古，蒙政委員會印，民國五十三年八月，頁一一一。

註⑧ Richard A. Geisler, *op. cit.*, p.201.

中蘇共關係的改善，中共仍無法忘記六十年代初在外蒙的失敗，因此要求蘇聯軍隊從外蒙撤出，乃成爲是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條件之一。由於中蘇共在國際情勢的關係上，早已非五十或六十年代的從屬關係，蘇聯的附庸外蒙已無力再指責中共所稱的「包藏吞併外蒙的禍心」。八十年代中期後，更由於中共力量的增長，外蒙在蘇聯心目中的地位，已較前大爲提高，蘇聯更給予外蒙在外交上享有「適當的」獨立地位。這可以從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七日外蒙宣佈與美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上獲得證明。中共對這項宣佈作出了積極反應。

五、外蒙的外交政策

從過去歷史來看，中、蘇兩共的衝突，是影響蘇聯——外蒙——中共三角關係的關鍵。蘇聯自扶植外蒙獨立後，儼然以「保護國」的主子自居。在中蘇共關係未顯著惡化之前，因恐中共出面干涉，蘇聯對外蒙的態度有些顧忌。但中蘇共雙方由意識形態的分歧演變成武裝衝突之後，外蒙的對外政策乃向蘇聯一面倒，其原本已無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更以蘇聯馬首是瞻，這可從外蒙前「外長」林沁（L. Rinchin）的一篇文章中找到證明。林沁指出馬列主義乃是外蒙外交政策所堅持不變的原則，並謂外蒙與蘇聯「兄弟般的友誼」永不可破。^①

八〇年代以來，外蒙與蘇聯的密切關係，被外蒙領導者形容爲「融合」（Fusion）的關係。前外蒙「第一書記」澤登巴爾曾撰文形容「蘇蒙兩國已進入經濟的與政治的融合……雙方已撤出國界上的關卡……沒有國家的邊境……也沒有國家的區別。」^②這種「融合關係」使外蒙成爲蘇聯對中共及其它亞太國家改善關係的「橋樑」。因此，外蒙在蘇聯蓄意的提拔下，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止，外蒙已與九十三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八六年五月廿八至卅一日，蒙共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總書記巴特孟和政治報告中宣稱，外蒙「黨和國家對外活動的最重要方針，是全面促進鞏固亞洲大陸的安全，發展該地區國家間的互諒和合作事業。」^③巴特孟和並強調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外蒙的一貫外交政策。究實而言，這正是蘇聯近年來一再要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但中共却用「三個障礙」來作爲與蘇聯關係正常化的一種「制衡閥」。

外蒙自我標榜是純「社會主義國家」，在外蒙境內絕對找不到一家私營的商店。今天蘇聯和中共的經濟改革，雖然進行得如

註① Rinchin, L. "The Foreign Policy of People's Mongol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cember 1974, p. 1.

註② Mongolia,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0, pp. 282-284.

註③ *Keesing's Archives*, Volume XXXII, October 1986, p. 34677.

如火如荼，但外蒙却仍無動於衷。外蒙「外長」杜格素倫（M. Dugersuren）認為外蒙的經改爲時尚早，除非蘇聯的經改進行相當一段長時間，而且行之有效，到那時外蒙再來推行經濟改革。^⑭當前外蒙的外交動向可分成內政與外務兩方面來分析。

1. 在內政方面：外蒙最主要的目的是發展經濟。此即第八個五年計畫（一九八六—九〇）。這第八個五年計畫，主要是生產資料的現代化，也就是加強現存的原料、資本、勞工和技術的充分利用。至於開發新的能源基地、擴充新工廠、爭取蘇聯經援與技術援助，都成爲這個五年計畫的主要內容。^⑮因之，從內政的角度而言，外蒙也需要一個內外和平的環境來發展其低度開發的經濟。蘇聯目前也從事經改，其對越南和阿富汗的軍經援助也到了力不從心的境地，蘇聯高唱和平，外蒙必須善於適應，從而扮演好「橋樑」的角色。

2. 從外務方面：外蒙介於蘇聯與中國中原之間，當蘇聯大唱和平經時，外蒙自必一再發出與中共及亞太國家改善關係的配合論調。蘇聯爲了執行其亞太政策，外蒙這個「橋樑角色」的地位已大爲提高。一九八七年一月廿七日外蒙宣布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如果背後沒有莫斯科點頭，烏蘭巴托怎敢自己做主。莫斯科的亞太政策，其主要目標首推北平。因此一年來，烏蘭巴托一再表示要與北平改善雙邊關係。烏蘭巴托甚至強調如果政治問題不能迅速解決，不妨從邊境貿易、領事問題、空中航線、文化交流等低層次開始。^⑯外蒙百分之九十七的貿易是經由蘇聯領土達成的，外蒙一直希望未來能經由蒙古縱貫鐵路從中國大陸天津市出口商品。因爲經由天津出海，是外蒙商品到亞太國家最方便迅速的管道。從歷史與地理上得知，外蒙一向是天津港的縱深腹地，未來也不會改變。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曾言：「北有二連，南有深圳」。二連是介於內外蒙之間的邊境城市。近年來二連的轉口貿易日益增加，中共與外蒙的雙邊關係在一九八七年一年中的確在飛躍成長。其未來的發展非常值得吾人注意。

六、結 論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重要演說，強調蘇聯要在未來的太平洋時代，成爲亞太地區的超強。戈巴契夫更一再表示要改善與中共的雙邊關係，因此他特別提到部份蘇軍將從外蒙撤出。半年之後即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

註⑭ "From Isolation to Prosperit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usiness Post), May 23rd, 1987, p. 3.

註⑮ Mongolia, *FBS*, November 10th, 1987, pp. 11-12.

註⑯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11, 1986, p. 1.

蘇聯國防部宣佈，將於四月間開始從外蒙撤出部份軍隊。這「部份軍隊」是指一個機械化步兵師及其他數個零散單位。據西方情報專家估計，蘇軍一個機械化步兵師有一萬零四百八十五人。而一個坦克師有八千四百一十五人。現駐外蒙的蘇軍有七萬五千人；其中陸軍有六萬五千人。^⑧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蘇聯國防部再發佈聲明，表示從一九八七年四月開始的部分蘇軍從外蒙撤回工作已告一段落。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國防部未進一步發表撤軍時間表。顯然蘇聯當局要視北平與華盛頓的反應，再採取下一步行動。這一次蘇軍撤軍行動，固然牽涉到蘇聯——外蒙——中共三角互動關係。但是，外蒙獲莫斯科同意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外蒙當局竟將這次蘇軍撤出，與要求美國撤出南韓部隊互為呼應。外蒙「外長」杜格素倫在訪問莫斯科時對記者表示，要求美軍從南韓和亞洲其它基地撤出。美國嘗試與外蒙建交，企圖在中蘇共之間的地帶建立一處外交觀察站，是老早就已存在的想法。七十年代初，美與外蒙之間，曾進行過一段時間的建交談判，但由於時機不夠成熟，蘇聯不允許外蒙開放大門，致這項建交談判無疾而終。一直到中共與蘇聯關係改善後，美與外蒙始達成建交。

由此可見，外蒙雖名為一個獨立「國家」，而實際上却為蘇聯的附庸。杜格素倫要求美軍撤出南韓，不過是傳達蘇聯之旨意而已。美軍撤出南韓與蘇軍撤出外蒙，在本質上是完全不能比較的。因為美軍駐軍南韓是為了防止北韓的南侵。基本上是守勢的駐兵，反之，蘇聯駐兵外蒙是威脅中共，是一種挑戰性的姿態。當廿一年前蘇聯與外蒙簽訂「新駐軍協定」時，蘇聯根本是不打算撤兵的。事實上，外蒙之所以能在共黨集團之外，和亞非拉地區的若干國家建交，承認其為一個獨立國家，也是蘇聯一手提携的結果。蘇聯若不允外蒙與其它國家接近，外蒙絕不敢擅採任何行動。反之，若蘇聯安排它與某國接近，或作其他的外交活動，外蒙也將毫無異議。

一九八四年八月，蘇聯突然撤換外蒙領導人澤登巴爾，而由江·巴特孟和（Jambyn Batmunkh）代之，雖然新聞報導說是「因病」，但資料顯示澤登巴爾並非自動辭職，而是被迫下臺，其原因相當複雜；但基本原因之一則是澤登巴爾當權太久，羽翼已成。這種政治情勢的發展，是莫斯科絕對無法容忍的。外蒙近四十年的發展都是依靠蘇聯和東歐諸國，百分之九十七的對外貿易都與上述諸國交易；因之，外蒙長期存在的進退兩難情況，就是如何能夠一方面維持在經濟方面的進步，一方面又能保留充分的「自治」。^⑨上述心態，充分顯示出作為一個蘇聯附庸國的可悲寫照。

外蒙的外交動向充分反映出蘇聯的外交企圖。當戈巴契夫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廿八日在海參崴表示要從外蒙撤軍後，當年八月上旬外蒙即提出邀請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訪問烏蘭巴托，中共以「聽其言而觀其行」的態度表示接受。中共與外蒙接觸

^⑧ *Ibid.*, January 16, 1987, p. 1.

^⑨ *Keesing's Archives*, Volume XXXII, October 1986, pp. 34678-34679.

後，迅即發展新關係，突破二十年來的冷凍關係，於八月十一日簽訂「領事條約」。中共與外蒙的貿易這幾年來也有發展。一九八五年雙方「以物易物」的交易額達七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八六年四月更首次簽訂「長期貿易協議」，協議有效期間由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〇年。其中規定中共輸出絲綢、水果和輕工業產品，從外蒙進口的是木材、皮革和鹿茸之類。雙方並恢復停頓了十九年的北平至烏蘭巴托的航線。

所有這些交流活動，都反映了莫斯科——烏蘭巴托——北平的三角互動關係正在進行調整。但是這一切是不是都轉向好的方向發展，就牽涉到北平與莫斯科的長期歷史因素了。外蒙雖有心走向「自主」，却無力跳出蘇聯的勢力範圍。直至今日，外蒙仍為一低度開發「國家」，其地域遼闊、軍力薄弱、人口稀少而分散。其土地雖大，但利用價值不高。今天，中蘇共正常化已在進行，中共與外蒙之關係亦有改善，外蒙在中蘇共之夾縫中，應有更大的迴旋餘地，但這種重要的戰略地位，仍然無法擺脫其做為緩衝地帶的角色。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中共與宗教

本書由本中心中國大陸組召集人汪學文主編，本中心研究人員汪學文、朱文琳、邢國強、廖淑馨、江振昌、陳永生、葉釋英等合著；內容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宗教觀、中共的宗教政策、中共與天主教、中共與基督教、中共與佛教、中共與伊斯蘭教、中共與道教等。全書廿二萬字，計四〇〇頁。實售平裝新臺幣二〇〇元，精裝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六元）。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三三四三六一二號

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戶

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

話：九三九四九二一轉二二六